

方刚性学研究系列

多性伙伴

方刚 著

李银河 刘达临 马晓年 阮芳赋 何春蕤

社会控制与私人性
行为之间的博弈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
性活跃者个案

独家揭秘多性伙伴
者的内心世界



群众出版社

方刚性学研究系列

多性伙伴

社会控制研究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性伙伴/方刚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5014 - 4750 - 3

I. ①多… II. ①方… III. ①性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①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0939 号

多性伙伴

著 者: 方 刚

责任编辑: 连玉泉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 17.25

开 本: 1/16

印 数: 1 ~ 1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4750 - 3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www.qzchs.com

电子信箱: qzchs@163.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2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一、多性伙伴：几个才算“多” 1

中国传统文化下对私人性行为的社会控制一向十分严格，“多性伙伴”对于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新词。直到20世纪80年代，婚外恋、婚外性，甚至婚前性行为，总之一切非婚性行为都是很少的，极为隐秘的，属于“另类”，受人冷眼与侧目。

- (一) 问题的提出 1
- (二) 以往研究中的多性伙伴现象 3
- (三) 重要概念的界定 8
- (四) 主要应用理论 11
- (五) 研究目标与假设 13

二、作者如何访谈多性伙伴者 17

我访问的女性有两类：一类是完全陌生的；另一类是非常熟悉的，原本就对她们的私人经历有很多了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一类是主动要求受访的女性。

- (一) 访谈对象的获取与伦理规则 17
- (二) 网上找来的志愿者可信吗 19
- (三) 男人访谈女人的性经历，能行吗 22
- (四) 为什么不能请助手协助访谈 26
- (五) 个案访谈要不要代表性 27

(六) 分析方法	29
----------------	----

三、多性伙伴：还有人“管”吗	31
----------------------	----

我24岁那一年，父母偷看了我的日记，里面记载着我与七八个男人的性关系。那之后，我与父母的矛盾就激化了，时常会争吵。

(一) 工作场所的“管”与“不管”	32
-------------------------	----

(二) 不同家庭的“管”与“不管”	47
-------------------------	----

(三) 居住社区“不管”了	57
---------------------	----

四、多性伙伴者的“性脚本”很活跃	61
------------------------	----

时尚界很开化，圈里人有情人是很公开的。常出双入对，从不回避别人的目光。别人私下的议论也仅限于谈论他们般配与否，从没有听到过歧视他们的谈话。

(一) 社会转型促成“性活跃”的性脚本	63
---------------------------	----

(二) 由“贞女”到“荡妇”的过程	73
-------------------------	----

五、对性行为的自我控制	80
-------------------	----

虽然处于同样的社会、同样的文化中，拥有的社会控制也大体相近，但是不同的受访者所感受到的社会控制力量普遍薄弱，而非多性伙伴行为者中的许多人，却会声称社会对私人性行为的约束还是很强的。

六、尚存的控制	92
---------------	----

绝对不能在公司里面找情人。生意伙伴做情人也不行。因为情人间不设防，而生意上有许多秘密。做了情人，就没有办法工作了。

(一) 自贬“嫖娼”经历	92
--------------------	----

(二) 同性性行为能说吗	96
--------------------	----

(三) 兔子能吃窝边草吗	99
--------------------	----

七、为了情，还是为了性	106
-------------------	-----

在他们和性伙伴的关系中，“情”和“性”都发挥着作用。而这一点，在男人和女人身上的差别并不大。主流社会所谓“男人为性，女人为情”的判定，至少在我们的访谈对象身上没有泾渭分明的表现。

（一）为什么做爱：三种倾向	106
（二）性与爱：看似矛盾的表述	108
（三）不敢言爱：更多是因为绝望	114

八、与性有关的话题	119
-----------------	-----

爱应该是由心去体会的，可是我现在体会不到了，就像眼睛失明了，耳朵失聪了一样，即使一份真挚的爱摆在我面前，我也感觉不到了。

（一）“网缘”会跨越阶级吗	119
（二）和多少人做爱才算够	127
（三）安全套，想说爱你不容易	133

九、总结与思考	140
---------------	-----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回报的。当人们无法通过性行为的“自律”从社会换回“利益”的时候，追求自我满足与身体快乐的多性伙伴行为便难免发生。

参考文献	150
------------	-----

附录一 本研究受访多性伙伴行为者基本情况一览表	154
-------------------------------	-----

附录二 多性伙伴行为者访谈笔记	157
-----------------------	-----

F01，女，22岁，失业，单身，性伙伴数12人	157
-------------------------------	-----

F03, 女, 32岁, 离异, IT从业, 受访时性伙伴数10人	166
F04, 女, 26岁, 已婚, 性伙伴数15人	175
F05, 女, 双性恋, 29岁, 未婚, 广告业, 性伙伴数: 男20人, 女15人	182
F06, 女, 37岁, 已婚, 记者, 性伙伴数近20人	191
F07, 女, 48岁, 离异, 工程师, 自述性伙伴数400人以上	202
F10, 女, 28岁, 离异, 编辑, 性伙伴数10人	217
F13, 女, 29岁, 未婚, IT业, 性伙伴数48人	226
F14, 女, 28岁, 未婚, 演艺界, 性伙伴数20人以上	241
M05, 男, 34岁, 职业经理人, 性伙伴数24人, 自我判定为 同性恋者	248
M07, 男, 43岁, 离异, 经商, 性伙伴数40人左右	258
M10, 男, 33岁, 已婚, 商人, 性伙伴数近30人	263

中国传统文化下对私人性行为的社会控制一向十分严格，“多性伙伴”对于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新词。直到20世纪80年代，婚外恋、婚外性，甚至婚前性行为，总之一切非婚性行为都是很少的，极为隐秘的，属于“另类”，受人冷眼与侧目。随着社会的转型，到了20世纪90年代，非婚性行为越来越多，商业性交易也十分普遍了，中国开始出现所谓的“性革命”。

一、多性伙伴：几个才算“多”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传统文化下对私人性行为的社会控制一向十分严格（潘绥铭，1995：2~31），“多性伙伴”对于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新词。1949年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始，便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一夫一妻制在这个国家早已深入国民之骨髓。直到20世纪80年代，婚外恋、婚外性，甚至婚前性行为，总之一切非婚性行为都是很少的，极为隐秘的，属于“另类”，受人冷眼与侧目。随着社会的转型，到了20世纪90年代，非婚性行为越来越多，商业性交易也十分普遍了，中国开始出现所谓的“性革命”。

正如潘绥铭教授指出的，中国当前性革命中的许多现象与西方社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经历的如出一辙（潘绥铭，1995：546~552），西方当年有的，中国现在也都有了。但是，中国的性革命是潜在的、地下的，远未表现出西方性革命运动中的轰轰烈烈。同样，多性伙伴行为者也是隐秘的。

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一生只有一个性伙伴（配偶）是很正常

的，多出一个（情人或其他）便颇奢侈了。1989年2月至1990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非随机抽样调查显示，除配偶外，另与一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城市为4.4%，农村为4.5%；与二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城市为0.8%，农村为1.1%；与三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城市和农村都为0.3%；而达到四人或四人以上的，在城市中只有0.4%，农村只有0.3%。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城市有88.1%、农村有93.7%的人，只与配偶发生过性关系（刘达临，1995：209~210）。

在经历了社会转型的十年之后，潘绥铭主持的于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进行的针对全国20~64岁总人口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表明，中国多性伙伴行为者出现了增多的趋势。确实有过婚外性行为的，女性为5.1%，平均有过人数为2.5；男性为21.2%，平均有过人数为4.2。潘绥铭等人据此总结说：“婚外性行为在中国正在增加，而且速度很快，尤其是在城市男性中。假如一直以目前的速度持续发展的话，那么每十年就会增加20%还多的发生可能性。”（潘绥铭，2004：270）

对“目前配偶”之外的“其他性伙伴”的统计显示，超过10人的，占总人口的0.7%，其中性伙伴人数最多的一个人为80人。但是，从没有过其他性伙伴的，仍然高达83%（潘绥铭等，2004：260）。

由以上数字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社会多性伙伴行为者日益增多。但是，仍然是极少数。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讲，如果告诉他们某个人曾与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上百个人发生过性关系，他们都会惊异地张大嘴巴。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转型前，中国也一直存在多性伙伴行为者，这与社会转型后多性伙伴行为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违规的，是受社会干预与处罚的，当事人要小心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后者则不再成为社会干预的对象，当事人甚至以此为荣，其行为处于半公开状态。由前者到后者的转化，正是此研究所感兴趣的。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多性伙伴行为者的个人行为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便更具有研究的价值。对于这一群体的考察，无疑最有助于认识性自由人士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博弈过程。

今年4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是20世纪60年代后出生的。在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充斥的仍是单一的、保守主义性价值观，包括对性

价值的贬损，对性与生殖紧密相连的推崇等（潘绥铭，2002a）。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被这种价值观有效地控制了。但是，在转型期的中国，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成为多性伙伴行为者，他们又是受到哪些不同机制的影响呢？

中国当下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性革命发生与发展机制的可能。更重要的是，研究社会控制与私人行为之间互动关系的可能。而性革命的先驱者和实践者——多性伙伴行为者——则可成为这一研究的起点。他们是如何超越社会控制；社会控制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性问题，可以成为观察社会与个人关系的一个视角。

（二）以往研究中的多性伙伴现象

1. 英语学术圈的研究

英语学术圈对于多性伙伴的研究已经颇多了，但能够检索到的都是抽样调查的定量研究，没有发现个案研究报告。性别差异、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种族差异等，在这些研究中均受到了重视。

罗伯特·迈克尔等人进行的“全美健康与生活调查”表明，18岁以后，男性中有过2~4个性伙伴的为21%，女性为36%；5~10个的，男性为23%，女性为20%；10~20个的，男性为16%，女性为6%；21个及其以上的，男性为17%，女性为3%。“人们现在之所以有更多的性伙伴，是由于他们既有性活动又处于单身状态的那段时间被大大拉长了。人们开始第一次性交的平均年龄一再降低，而他们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又不断提高。同时，人们现在离婚的可能性也增大了。这就意味着在离婚和再婚这段时间里，他们必须寻找新的性伙伴。”（罗伯特·迈克尔等，1996：142）

人们的文化程度越高，他们在一生当中便会有更多的性伙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教育多的人往往在上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推迟婚期，他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遇见更多的伙伴，越可能有更多的性行为，并且与一系列伙伴共同生活。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有过度的性欲，而是因为他们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机会去结识性伙伴，而最后才建立专偶的或接近专偶的婚姻关系。”（罗伯特·迈克尔等，1996：143）

男性有众多性伙伴的可能性比女性大得多，成年人一般在二十来岁的时候积累数目最多。

西班牙男人中报告有多性伙伴的是女人的五倍，其中没有结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收入的人居多。西班牙人强调男性气质的骄傲感，这被认为可能是促成性伙伴多的原因。“玩女人”和嫖娼，都符合“好男人是女朋友最多的人”这样的传统观念。女人中的多性伙伴者也是年轻的、未婚的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居多（Sabogal, Fabio, Faigles, Bonnie, 1993）。

对黑人的一项调查显示，19%的被调查者说过去的一年间有过两个及其以上的性伙伴。其中男性为30%，女性为10%。单身为25%，结婚或同居的为8%（Peterson, John, Catania, Joseph, 1993）。

对1334名18~25岁的城市青年调查，男人中多性伙伴者是女人的两倍多，未婚是已婚的八倍多。在白人，受过十二年或更久教育的多性伙伴者是那些没有受过高中教育的人的四倍。但在西班牙人和黑人中，教育不构成影响因素（Binson, Diane, Margaret, 1993）。

这些研究主要都是报告多性伙伴行为者特点的。这些特点还包括：青春期的青年比成年人更多报告他们的多性伙伴情况（Forrest, Singh, 1990），青春期的女性比青春期的男性更多报告多性伙伴情况（Smith, 1991）。

1988年，对美国全国的一份家庭调查数据被多项研究应用。一项研究表明，在15~44岁的女性当中，那些多性伙伴行为者更多是第一次性行为发生比较早、年龄不到30岁、没有结婚、生活在城市、收入在高出最低贫困线两倍以内、在外工作而非家居和没有宗教信仰的。没有结婚的青少年和没有结婚的妇女一样，在他们二十多岁的时候更多地拥有性伙伴。同样，艾滋病的危险也更多地集中在年轻、未婚、城市居住和高教育程度的人身上（Binson, 1993；Dolcini, 1993）。

研究显示，十四五岁的少年中一些人便是多性伙伴行为者了。有过6个以上性伙伴的，14岁的女性中有8%，21岁的女性中有31%报告，而在同样年龄的男性则为14%和45%。21岁的人中，只有13%的男性和20%的女性报告说只有一个性伙伴。结婚女性比未婚女性在过去三个月中的性伙伴数少，结婚男性也是一样。14岁之前便发生性关系的男性的性伙伴数，是16岁或其后发生首次性关系的男性的两倍。第一次性生活早对性伙

伴数的影响，在女性身上比男性身上更明显（Santelli, John, Brener, Nancy, Lowry, Richard, Bhatt, Amita, Zabin, Lauris, 1998）。

还有的研究涉及种族和宗教问题，它们揭示出，白种女人和黑种女人在多性伙伴问题上没有差别。在美国西部出生的，更多多性伙伴者，因为那里的宗教感差。未婚女人中，她们的母亲在17~24岁生育第一个孩子，比那些母亲在24岁之后生育的更多是多性伙伴者。母亲全天在外工作的女性，比母亲半天工作或不外出工作的女性，多性伙伴者多出53%（Edwards, 1994a）。

少数研究强调多性伙伴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如认为多性伙伴行为会引起社会的功能紊乱、性传染病，以及社会暴力（Immerman, Ronald, Mackey, Wade, 1999）。多性伙伴行为与酗酒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在很多时候，酗酒都影响到人们的性行为，包括一个人的性伙伴数目。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多性伙伴者坚持拒绝使用安全套，使得性传播疾病的预防变得困难。

在性活跃的成年人中，在调查前一年有13%的人与一个以上的人有性关系，但是他们当中只有8%的人坚持使用安全套，几乎所有（95%）的人不坚持使用安全套（Edwards, 1994a）。

在西班牙人中，20%的人和他们的稳定的性伙伴使用安全套，29%的人与他们第二个性伙伴使用安全套。在男人中，安全套的使用率随着性伙伴数目的增多而减少（Sabogal, Fabio, Faigeles, Bonnie, 1993）。

另一项研究说，35%的女性和53%的男性说他们在最近一次性生活中使用了安全套，是否使用安全套与性伙伴数没有关系（Santelli, John, Brener, Nancy, Lowry, Richard, Bhatt, Amita, Zabin, Laurie, 1998）。

又一项调查显示，同第二个性伙伴使用安全套的人多于同主要性伙伴的。但47%的人在过去一年间，不同主要性伙伴使用安全套；35%的人不同第二个性伙伴使用安全套（Peterson, John, Catania, Joseph, 1993）。

还有调查显示，多性伙伴行为者中40%的人无论和第一个还是和第二个性伙伴都没有使用过安全套，并且安全套的使用率也随着性伙伴数目的增加而减少（Binson, Diane, Margaret, 1993）。

也就是说，“性生活最为活跃的人们，也就是那些被传染上艾滋病风

险最大的人们，好像并没有因为害怕艾滋病而改变他们的行为”（罗伯特·迈克尔等，1996：151）。

2. 中国的多性伙伴研究

潘绥铭等人对前面提及的中国随机抽样获得的多性伙伴行为者情况进行了分析，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此前对多性伙伴行为者唯一的研究。其中，性别差异、阶层差异、文化差异等，同样成为重要视角。

“在每月收入最高的那5%的人里，有45.1%有过婚外性行为。可是在每月收入最低的那40%的人中，却只有5%的人有过婚外性行为。”（潘绥铭等，2004：269）

“婚外性行为最多的是上过大专的男女（27.6%~29.9%）和上过高中的男女（24.3%~25.4%）。可是大学文化以上和只上过初中的人，有过婚外性行为的却少了将近一半。……从表面上来看，婚外性行为主要是那些念书不多不少的人们的事情。但是，这其实并不是文化高低的问题，而是机会多少的问题。上学太多，就容易眼光高，减少了选择的机会；不上学，则几乎没有机会去选择。”（潘绥铭等，2004：271）

对有过21个及其以上的性伙伴的人的分析显示，“他们全部是男人，年龄中位数是30.5岁，文化程度主要是初中和高中，几乎都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个人收入在中等以上，以商业服务业、娱乐业和个体劳动者居多，主要是初婚者，主要居住在大城市里，单独外出时间和平时的社交频率几乎都在中等以上，没有一个身体不太好的，基本上都认为自己的魅力比较大和很大，尤其是性观念的开放程度都在中等以上”（潘绥铭等，2004：260-261）。

潘绥铭针对这次调查对多性伙伴行为者作出了更多分析：“至少在笔者所考察的阶层变量中，无论归属于哪个阶层的男女，发生多伙伴性行为的可能性都没有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多性伙伴现象并不是一种阶层化的行为的产物。或者反过来说，当前的任何一个社会阶层给自己规定的行为规范，或者已经不足以阻止多伙伴性行为的发生，或者根本就没有包括这样的禁规。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那些性欲望和性能力都比别人更强的人，才会去寻求和发展多伙伴性行为，而‘一般人’只要有一个性伙伴就足

矣。但是我们的统计分析却揭示出：性状况（包括性欲望和性能力两个方面）越良好的人，反而越不容易发生多伙伴性行为。或者说，在性方面不那么‘强壮’的人，发生多伙伴性行为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一些，只不过在男性中表现得更显著一些而已。

“越是目前性爱状况好的女性，越不可能发生多伙伴性行为。可是如果再看男性，就可以引出一个似乎违背常识的推论：越是现在的性爱状况好的男人，发生多伙伴性行为的可能性反而越大。这其实说明了一个社会性别意义上的问题：由于社会地位在整体上的不平等，男人和女人对于现有的性爱的依赖程度也就大不一样。对于处在弱势地位的女性来说，现有的性爱越美好，女性就越容易更加依赖它，因此不再他顾。可是对于处于强势地位的男性来说，性爱现状越良好，往往越容易增强他在处理性关系方面的自信，从而更可能去寻求新的、他认为肯定是更加美好的性爱。

“自己可能不可能发生多伙伴性行为，是女性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基本价值观。在它面前，现有性爱的好坏、周围人的潜移默化、性的生物状况等等虽然也在发挥着作用，但是其作用强度却相对地小得多。”（潘绥铭，2002b）

3. 继续研究的空间

正因为以往的研究都是调查统计的定量研究，而缺少深入的个案研究，所以，为本项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扩展空间。

定量方法的标准化和精确化程度较高，逻辑推理比较严谨，因而更客观，促进了对现象之间普遍的因果关系的精确分析。但定量方法也有局限性，比如说，由于是对大量样本的少数特征做精确的计量，因而定量方法很难获得深入、广泛的信息，容易忽略深层的动机和具体的社会过程。它得到的信息往往是表面的、肤浅的，难以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而对多性伙伴行为者的研究，如果不抓住不同个体的内心动机，便难以深入。

比如，所有这些定量研究都没有揭示出，为什么在绝大多数人仍“循规蹈矩”的情况下，少数人却可以有很多的性伙伴，他们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抽样统计学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本研究试图以深入的个案访谈为研究方法，重点引导被访者回溯对社会控制的解构过程、这种解构得以实现的客观原因、个人违规背后的心路

历程，以及违规的个人是如何与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进行博弈的。

再比如，许多研究显示，多性伙伴行为者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并不高。是他们不了解自己行为的风险吗？还是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些定量研究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而通过深入的个案访谈，我试图在此项研究中探索多性伙伴行为者不使用安全套背后的深层原因。

我们看到，潘绥铭的研究对多性伙伴行为者的内在动机作了许多精彩分析。但是，这些分析仍是建立在对数据的合理的逻辑推论基础上，无法通过定量研究本身进行检验。而深入的个案访谈，却可以检验这些推论。在我的这项研究中，同样试图考察潘绥铭上述假设的普遍性。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个案研究的结果绝对无法全面检验根据统计抽样数据进行的分析。因为前者是定性的深入访谈，其全面的代表性一直受到置疑（对此我们还将在随后的章节中进行讨论）；后者却是定量的。但是，没有人会怀疑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仍然可以相互补充，提供给我们更全面的，即使不是最全面的认识。

（三）重要概念的界定

1. 多性伙伴行为者

本项研究中的“多性伙伴行为者”需要同时符合两个条件：

（1）到接受访谈之日有过不少于 10 名性伙伴的人士，这 10 名性伙伴当中可以包括同性，但不能只是同性。

（2）至少曾经有一次在三个月内同时与不少于两个人保持着性关系的经历，其中包括配偶。

而对性伙伴的定义为：即使只有过一次一次性关系（阴茎插入阴道或肛门的性行为），包括嫖娼行为，也算作一个性伙伴。

之所以将性伙伴数定义在大于、等于 10 人，是综合参考前面提到的罗伯特·迈克尔等人进行的“全美健康与生活调查”以及潘绥铭等人在中国进行的全国抽样调查的结果，具有 10 个以上性伙伴的人均很低，利用其极端性更便于研究他们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

罗伯特·迈克尔的调查报告在去掉没有性伙伴的被调查者之后，将“18 岁以后的性伙伴数”分为五个等级：1 个，2~4 个，5~10 个，10~

20个，21个及其以上。其中在总人口中，有过5个以上性伙伴的人高达54%，其中10个以上的为33%（罗伯特·迈克尔等，1996：151）。我这里选取其比较居中偏右的“10人”，也是因为这个人数即使在美国也属于社会中的少数人，他们身上体现着少数人群与主流社会的种种互动关系。

而潘绥铭在中国进行的调查也显示，超过10个性伙伴的，只占总人口的0.7%（潘绥铭等，2004：260）。

本研究只选取以异性为性对象者，以及同时以异性和同性为性对象者。这里之所以回避使用“异性恋者”、“双性恋者”这样的用词，是因为考虑到不能够仅以性行为对象来确定一个人的性倾向。而之所以将只以同性为性对象的多性伙伴者排除在研究之外，是因为在同性多性伙伴性行为者比较于前两个人群，特别是第一个人群，面对着相当不同的文化、舆论环境以及社会控制机制，而作为一个小型研究，本研究无法涉及太多的变量。

之所以又规定“至少曾经有一次在三个月内同时与不少于两个人保持着性关系”，也是参照国际研究惯例。像我们在“以往研究的回顾”中引用的英文研究，绝大多数都将在同一时期内（通常为三个月）具有不少于两个性伙伴作为多性伙伴行为者的界定依据。

在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中文研究文献中，对同样的研究对象使用的均是“多性伙伴行为者”这个称谓，考虑到“性伴侣”在中国人的语汇与思维中有“长期”“固定”的含义，而我们的研究包括性交易关系与“一夜情”式的性关系，所以笔者以为“性伙伴”一词似乎更为确切。

2. 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分为三类：自我控制、非正式控制、正式控制。本项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自我控制与非正式控制对当事人的影响。

（1）正式控制

社会控制是指一个社会的统治者，以社会组织体系为中介，运用社会规范以及与之相应的手段和方式，对社会成员（个人、群体、组织）的社会行为及价值观念进行制导和约束，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的行为，其目的是使社会按符合统治者利益的规则运转。然而，在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社会转型的中国，对于私人性行为的正式的社会控制已经不再那么突出了，法律上明确禁止的也只有“聚众淫乱”。按着“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都是可

以做的”这一原则，多性伙伴行为所受的正式社会控制十分有限。

(2) 自我控制

自我控制是最有效而且花费最少的控制，它也最经常使用，只是我们许多时候意识不到，它需要每个人都发展出强烈的道德心。罗斯提出，“高超的控制方法是精神上的”，“一个良好的检验标准是自发性”，“只要社会把它的规范和准则铭记在其成员的心上，我们依靠各种控制形式又有什么关系呢？”（罗斯，1988：325 ~ 331）。

(3) 非正式控制

其主要依赖同龄群体、家庭、朋友、同事以及其他对个人发生作用的群体及组织的影响。这些群体带给个人强大的压力，个人害怕被抛弃、被羞辱，所以要遵循群体规范。

正式控制是官方的决定以及体系的建构所决定的，它的效果小于前二者，但仍会对个人的行为构成影响，其控制手段主要是奖励与惩罚。

特别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本研究中所说“社会控制的解体”，均指针对私人性行为的社会控制的解体，与其他方面的社会控制无关。

3. 社会控制组织

本研究关注的社会控制组织主要是：家庭、社区、单位。

(1) 组织

对人们性活动进行非正式控制需要通过一些“组织”（Institution）来实施，而组织又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做到这一点：

首先，组织提供了一些规则 and 标准，这些被认为是应该遵循的，并且是人们赖以建立自我控制的基础（Charon, 1979）。

其次，那些占据组织中心位置的人，利用人们之间的互动，作为非正式控制的基础。

最后，这些组织拥有制裁的系统，当标准被冒犯的时候，这些系统就会发生作用。

美国的研究显示，直接影响美国社会性观念与性行为的两个重要组织是宗教和家庭，害怕被制裁是组织成员遵纪守法的一个重要原因（DeLamater, 1981, 7）。

(2) 宗教